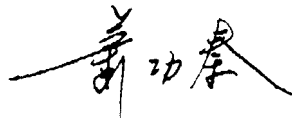


中國轉型體制的類型學



制無美惡，期於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

——嚴復：《憲法大義》

一

中國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隨着經濟發展與變革，社會政治結構發生了甚麼樣的變化？從政治學角度來看，這種政治體制跟改革以前的體制相比較，有甚麼新的特點？筆者曾在一些文章中對這種體制作了如下的概括分析：

改革以來的中國社會，存在着有限的多元化。在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主義全能體制下，社會是高度一元化、同質化與板塊化的。全能主義國家政權滲透到社會各層次的幾乎所有組織細胞，對社會基層組織與個人具有廣泛而深入的政治控制力與動員力。而在當今體制下，中國已經通過市場經濟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領域的自主社會空間，政治控制的範圍逐漸縮小，僅局限於與國家及政權安全直接或間接相關的領域。社會文化、教育、娛樂、學術研究、非政治的社團，作為「第二文化」，與政府主導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這些自主的社會建制與組織，如果進一步發展，形成網絡，就會形成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興的健康而充滿活力的市民社會。在這裏，市民社會指的就是國家控制力以外的、體制外的自組織系統。

其次，意識形態領域仍然保持社會主義的基本符號體系，作為執政黨組織整合與黨內凝聚的基礎，但其意識形態的符號內涵已經不再具有原來的平均主義的目標意識。而改革開放以後形成的體制，主要通過現代化的權威政治作為政治整合的基礎，但已經揚棄了教條意識形態所體現的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政治動員，並力求以經濟實效性，以及對美好社會與和諧社會的追求，來獲得公民對政權的支持。在當今中國，政體的實效正當性已經取代了烏托邦平均主義的「天國」理念，作為國家認同與社會聚合的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已由社會主義全能體制下，高度一元化、同質化與板塊化的狀態，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領域的自主社會空間，政治控制的範圍也在逐漸縮小，意識形態領域仍然保持社會主義的基本符號體系，但已經揚棄了教條意識形態所體現的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政治動員。政體的實效正當性已經取代了烏托邦平均主義的「天國」理念，作為國家認同與社會聚合的基礎。

第三，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繼承了全能體制下執政黨的國家動員力的傳統資源，作為實現本國現代化的權威槓桿，從而仍然具有較強的進行體制變革的動員能力。與此同時，也承襲了全能體制下社會監督機制不足的問題，而這種監督機制的缺失所引起的瀰散性腐敗與無序化，又有可能反過來蠶食這種國家對資源的動員能力^①。

質言之，當代中國非政治領域的有限多元化、私域自由空間的擴大、意識形態的世俗化，以及以執政黨體制為基礎的社會動員能力與命令機制的存在，這幾個特點構成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政治體制的最重要特徵。大體上可以認為，中國自80年代以來的二十多年裏，尤其是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後，已經通過「維新模式」而不是革命模式，完成了從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政治集權體制向更具多元性的社會政治模式的轉變。

從政治社會學角度來進行分析，這種歷史轉變，對於中國政治現代化與未來民主化無疑具有重要的實質性意義。那就是，新型的契約性人際關係、通過討價還價的協商機制，以及與此相對應的法制觀念、政治文化上的進一步寬鬆化而互容性增加，正是在市場經濟中，並只有通過市場經濟的實踐而培養出來的，這些都是實行中國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

如果說，以上是對中國模式的特點的描述，那麼，用甚麼核心概念可以表徵這種新型政治模式的特點？從政體類型學角度而言，當代中國人是生活在甚麼樣的政治社會結構中？在研究過程中，筆者最初嘗試運用比較寬泛的「權威主義」來表徵這種政治模式，因為執政精英在保持權威控制的同時，現代化體制內已經出現了有限多元化，從而具有現代化權威政治的一般特徵，但後來發現，單純運用這一概念來表徵中國的現行體制，仍然是不全面的，它容易把中國與東亞權威主義做出簡單的類比與聯想，而不易把握中國改革後的體制與傳統體制之間的歷史承續關係這一重要特點。更重要的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形成的政體形態與一般意義上的權威主義模式這兩者之間，無論在歷史背景、意識形態、政治文化、國家的組織資源方面，還是在對社會的動員機制與社會多元化程度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異。

後來筆者發現，由於這種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現行體制是在中國經歷了近二十年的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從原來的列寧主義的全能主義體制中逐漸演變過來的，因此，運用「後全能主義」(post totalitarianism) 來概括當今中國政治的特點，確實能表達這一新的政治結構模式與傳統全能主義之間的歷史連續性。然而，後全能主義只是一種歷史時段的描述，沒有能揭示結構特點。因此，筆者進而綜合以上兩方面特點，把這種體制定義為「後全能主義型的技術專家治國型的新權威主義體制」(post totalitarian technocratic new authoritarian regime)，即從全能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中演化過來的現代化的權威體制。由於中國二十年改革開放過程中取得的實效，政治中心的權威合法性資源已經有了新的來源，執政中心也在社會利益分化過程中獲得了新的社會基礎與支持者，實際上具有相當強韌的政治穩態性與持續性。可以認為，世紀之交的中國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新型政治時代。只有未來某一個時候，在經濟發展到一個更新的階段，在內

中國自80年代以來的二十多年裏，已經通過「維新模式」而不是革命模式，完成了從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政治集權體制向更具多元性的社會政治模式的轉變。筆者把這種體制定義為「後全能主義型的技術專家治國型的新權威主義體制」，這是一種介乎於完全沒有社會多元化的全能主義，與未來具有中國特點的民主政治之間的一種過渡性政治形態。

部社會結構發生相當的變化以後，它才可能向一個具有中國特點的新型民主政治形態轉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一種介乎於完全沒有社會多元化的全能主義，與未來具有中國特點的民主政治之間的一種過渡性政治形態。

二

人們自然還會進一步提出這樣一些問題：中國是如何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從全能主義的政治結構演變為現行的體制的？這種的變革採取甚麼樣的歷史路徑？中國的這種轉型政治體制對於經濟發展有甚麼特殊優勢，面臨甚麼樣的發展矛盾？

這些問題，都是筆者近年來一直在思考與探索的。所有這些問題，均可以納入到轉型政治學的研究領域中來。通俗地說，「轉型政治學」(politics of transition) 就是轉型期政治學，它運用政治學、社會學與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與基本概念，來考察一個國家從傳統體制向現代體制轉變過程中的政治與社會問題，以及相關的思想文化現象。它以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變遷與發展路徑作為考察的焦點。

轉型政治研究在國際學術界已經是一門相當重要的新的政治學領域，並已經出現一系列具有重要國際學術影響的研究成果。90年代初，研究拉美權威主義政治向民主政治轉型的學者施米特 (Philippe C. Schmitter)，曾提出了「轉型學」(Transitology) 這一概念。轉型學最初是由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研究中形成的跨學科理論學科。「轉型學」這一概念，給了筆者極大的啟示，它把研究者的視線，引導到轉型的歷史過程上來。根據筆者所掌握的文獻，把非西方國家的政治變遷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當今世界上現存的可資比較的主要轉型方式，大體上有四種類型。它們是拉美模式、南歐模式、東亞模式、蘇聯東歐模式。各種政治轉型模式都有其獨特的轉型特點，例如，南歐模式是長期處於歐洲資本主義大環境中的一種成熟的權威主義，向多黨民主體制轉型的，這種模式具有強國家與強市民社會相結合的結構特徵。拉美模式的主要特點是，這些國家是在民粹主義政治與軍事權威政治的拉鋸互動中演進的。蘇東模式則是通過激進的「大爆炸」方式，即經濟與政治的「休克療法」，來實現一種體制向另一種西方多元體制的政治轉變，這種模式的弱國家與弱社會的共存，可以解釋它在發展過程中何以如此不穩定，何以充滿陷阱與挫折，也可以解釋形形色色的「顏色革命」何以此起彼伏。東亞模式(即四小龍模式)是在冷戰過程中，在兩大陣營的對立衝突中，通過權威政治走向多黨競爭性民主。在對以上四種不同轉型模式的研究過程中，都產生了一些具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學學者，例如林茨 (Juan J. Linz) 對南歐模式的研究，施米特與奧唐奈 (Guillermo O'Donnell) 對拉美模式的研究，普熱沃爾斯基 (Adam Przeworski) 對東歐轉型的研究，等等。

從世界各國現代化轉型視角來看，中國的轉型模式與上述所有模式均不相同。正如本文前面已經提到過，中國的政治變遷有其獨特性，一方面，中國的

當今世界上現存的可資比較的主要轉型方式，大體上有以下四種：南歐模式是具有強國家與強市民社會相結合的結構特徵；拉美模式是在民粹主義政治與軍事權威政治的拉鋸互動中演進的；蘇東模式則是通過激進的「大爆炸」方式來實現一種體制向另一種西方多元體制的政治轉變；而東亞模式是在兩大陣營的對立衝突中，通過權威政治走向多黨競爭性民主。

現行體制具有全能主義體制的歷史背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新權威主義對現代化進程的政治整合功能，中國轉型模式不能歸入任何一種已有的類型或模式中。如何判斷這一結構的類型特徵？這是中國變革實踐對國際政治學理論提出的一個問題。

可以說，相對於前面四種已有的轉型模式而言，中國在執政黨的主導下，通過適應市場經濟變革而逐漸形成的「後全能型權威主義」是轉型分類學上的一個新的「物種」，我們也可以稱之為「中國越南模式」。它的特點是，由於承繼了傳統社會主義體制資源，從而具有強大的對變遷過程的可控制性，以及整合資源的制度優勢，它在經濟發展中獲得的成功，在轉型中面臨的問題、困難與矛盾，也可以從這一模式的歷史特點與結構特點中得到解釋。迄今為止，國際政治學界還較少有學者對中國這樣一個從社會主義全能體制演化過來的新型政治結構，做過宏觀的系統的類型學考察。

要把握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發展，就必須把中國模式放在與上述這些轉型模式相比較這一更廣闊的架構上來考察。這種模式比較，可以提供一個宏觀的平台，啟示研究者從國際轉型政治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從他們提出的一些重要比較變項中（例如，從歷史背景、政治精英形成的方式、轉型戰略、政治約束條件、意識形態在轉型中的重要性，以及意識形態轉型方式、權威合法性轉換、政治參與方式變化、社會自組織系統的特點、政治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改革的政治約束條件、路徑依賴程度等等各個方面），來考察我們自己國家轉型模式的特點。只有通過宏觀比較，才能發展出我們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理論。

三

如果從轉型的歷史過程來看，我們可以注意到，中國採取了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特殊歷史路徑。筆者注意到，我國一些經濟學家運用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演化經濟學的一些分析概念，用來對照中國經濟改革時，發現中國的經濟變革的政策經驗，恰恰與演化經濟學理論有着驚人的聯繫^②。筆者由此進一步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即如果我們能從演化經濟學的一些理論中，進一步提煉、抽象並概括出更具普遍性的演化發展理論，那麼，人們一定會發現，中國政治變遷過程也恰恰同樣符合演進理論的一些基本原則。筆者甚至覺得，用「演化政治學」來形容中國轉型政治的特點，確實是再適合不過了。大體上，我們可以從演化經濟學提供的理論啟示中，對中國二十多年政治發展的特點，在理論上歸納為以下一些特點。

首先，是中國模式演化的試錯性質。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執政精英，強調實踐中的摸索，來尋求擺脫舊體制的發展路徑，即不是從已有的先驗原則或信條為基礎，而是通過面臨具體問題時，運用傳統政治體制提供的執政黨權威政治資源，在人的理性並沒有搞清制約中國發展的諸多因素的複雜關係之前，在人的理性決策能力與解決困難的複雜性之間，存在着巨大差距的情況下，即存在

中國在執政黨的主導下，通過適應市場經濟變革而逐漸形成的「後全能型權威主義」是轉型分類學上的一個新的「物種」，也可以稱之為「中國越南模式」。它的特點是，由於承繼了傳統社會主義體制資源，從而具有強大的對變遷過程的可控制性，以及整合資源的制度優勢，它在經濟發展中獲得的成功，在轉型中面臨的問題、困難與矛盾，也可以從這一模式的歷史特點與結構特點中得到解釋。

着演化經濟學所稱的巨大的「能力—困難缺口」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實踐、摸索、局部的試錯，逐漸形成行之有效的政治與經濟政策。如果說，中國的經濟改革的成功，暗合演化經濟學的理論解釋，那麼，中國政治轉型採取的路徑也暗合政治演化學理論揭示的試錯路徑與邏輯。

中國模式的第二個特色，是它與傳統的非斷裂性。中國轉型實踐的特點是，強調並尊重中國現行政治體制轉軌的歷史連續性，而不是與歷史上形成的秩序斷裂，在這一原則基礎上，通過走小步，走穩步，不停步的方式，穩健地走上了中國政治發展的新路。二十多年來，中國改革政策的制定充分考慮到本國社會主義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社會規範、文化遺產與社會主義體制的傳統，通過這種漸進的「試錯」方式，來保證不會引起社會的斷裂與規範的缺失，不至於陷入「舊者已亡，新者未立」的失範危機。根據演化學理論，一個國家與民族的連續性是受一種無形的歷史力量保障的，這種歷史上形成的無形權威，是由人們約定俗成的價值觀、思維模式、行為模式、傳統類型、風俗習慣、信念與傳統來維繫的。執政精英充分調動了這些傳統整合資源來維持轉型的穩定性。這與當年嚴復提出的「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的思想極為相合。

第三，中國的政治轉型，也與演化經濟學家所研究的經濟轉型一樣，遵循着「最小打亂原則」。即中國改革開放中的政治政策創新，對既存制度體系的「打破」與「衝擊」，並不大於維持社會日常運轉所必需的共同體框架「完型性」與歷史連續性^③。這樣，就能在制度創新與制度保持之間，維持着適當的平衡。制度變遷須要改變人們慣常的行為模式，但人們適應創新的活動範圍，則取決於人們感到制度與決策創新必須約束在恰當的範圍內進行，「最小打亂原則」充分考慮到制度變遷的適應性、連續性與漸進性。在這一方面，中國執政黨的意識形態發展，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以及「三個代表」論、「和諧社會」論的發展路徑，均可以體現這一演化路徑的特點。

第四，充分重視改革的約束條件，考慮它們的特定情境與特定的脈絡。關於政策的形成，一方面是精英在國家制度的限度範圍做出的決定，一方面是受公眾與社會環境的影響，同時受歷史、地理與中國面對的國際生存環境的制約。這三方面的因素，是理解中國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政治演進路徑的關鍵。換言之，中國的政治變化決不是執政精英主觀意圖的簡單外在化，而是政治精英、知識精英與社會大眾三方面因素制約下，在政治互動過程中，逐漸發展出新的模式的，在這種相互依賴的不同因素的制約下，產生特定的路徑與轉型模式的獨特性。

更具體地說，中國的執政精英總是針對具體矛盾與困境，提出某種解決辦法，這種辦法受制於特定的思想、觀念與價值，也是根據行動主體本身所能調動的政治與社會資源。在作出這一選擇以後，又會產生某種實際結果，這一結果迫使主體又根據事態而不斷修正，行動的結果又制約了下一步選擇，為了保持已經取得的成果，又不得不再走出新的下一步等等。這樣，在不經意中，人們創造了一段歷史，這一歷史並不是人們主觀意圖與理性的設計，而是綜合各種因素相互作用，最後達到一個不自覺的政治結果。用黑格爾(G. W. F. Hegel)

對中國二十多年政治發展，理論上可歸納為以下一些特點。首先，是中國模式演化的試錯性質。第二個特色是它與傳統的非斷裂性。第三，中國的政治轉型遵循着「最小打亂原則」。第四，充分重視改革的約束條件，考慮它們的特定情境與特定的脈絡。這樣，在不經意中，人們創造了一段歷史，這一歷史並不是人們主觀意圖與理性的設計，而是綜合各種因素相互作用，最後達到一個不自覺的政治結果。

的話來說，重要的不僅僅是人們主觀上想做成甚麼，重要的是由於人們的行動，不自覺地做成了甚麼。這就是試錯性的歷史變遷。

正是這種被鄧小平稱之為「摸着石頭過河」的試錯漸進模式，使中國模式與前蘇聯的經濟與政治休克的激進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概括地說，中國正是通過這種可以被稱之為「路徑障礙，試錯反彈」的方式，逐漸告別了舊體制，並逐漸演化、蛻變為一種新的政治體制，完成了從與計劃經濟時代相適應的全能主義政治體制，向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後全能主義的權威政治體制」的軟着陸。新體制與全能主義體制之間的歷史連續性，對於理解當今中國政治具有重要意義。在這種演化型的轉型過程中，執政精英並沒有像那些自由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那樣，從泛道德主義的標尺，把傳統體制判斷為無用的廢物予以遺棄，而是把傳統政治資源作為轉型過程的政治整合所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予以發揮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改革，用嚴復1906年所說的那句話，體現了「制無美惡，期於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的原則。我們可以把中國近代最偉大思想家嚴復整整一百年前所揭示的這句話，作為中國轉型經驗的十六字真言。

中國轉型過程中，執政精英並沒有把傳統體制判斷為無用的廢物予以遺棄，而是作為轉型過程的政治整合所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繼續發揮作用。用嚴復的話說，中國的改革體現了「制無美惡，期於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的原則。中國模式是通過漸進的改革，在領導權力體制並沒有經過革命斷裂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新的結構。

中國模式是通過漸進的改革，在領導權力體制並沒有經過革命斷裂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新的結構。由於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以革命思維，以與舊傳統、舊世界徹底決裂，作為核心價值，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世紀之交的中國人這種對漸進思維的回歸，深刻體現了中國人的政治文化心態與深層思維方式的重大變化，具有反思二十世紀革命思維的里程碑意義。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發展路徑的研究，即對中國轉型政治學的研究，對於發展出一種與「演化經濟學」相呼應的「演化政治學」，具有重要的學理價值。

然而，必須特別指出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這種從全能主義結構蛻變出來的轉型模式，雖然有其特殊的優勢，但也有其特殊的弱勢。首先，這是一種從全能國家體制中，通過市場經濟而滋育出細小的社會細胞體的「極強國家—極弱社會」體制。從歷史上看，全能主義國家體制內部，本身就先天地缺乏體制內部的監督機制，而改革以後形成的「極弱社會」本身，又缺乏體制外的對國家官員的有效監督力量。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腐敗與權力不受約束而造成的種種腐敗與社會不公現象，就會在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中變本加厲。一旦出現社會矛盾激化與社會不滿，就會進一步引發國家對社會的加強權威控制的習慣衝動，極強國家可以運用無所不在的行政機器，輕而易舉地通過強控制的方式，把社會衝突壓抑在一定範圍內。這樣，就有可能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社會矛盾—加強控制」的路徑依賴，即通過加強控制、約束社會自主空間的方法來解決發展中的問題與矛盾。久而久之，這種自我強化的路徑，就會引導人們不自覺地進入一種路徑鎖定狀態。

在極強國家控制了強大政治資源的情況下，這種以強控制方式來應對矛盾的辦法，表面上看成本甚低，收效較快，而且很少受到社會的強烈反彈，然而，這樣做最終會導致民主的制度創新難以在應對社會矛盾過程中健康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現行的轉型模式存在着制度創新與路徑依賴之間的賽跑。制度創新的速度如果快於後者，中國有可能順利實現政治現代化，反之，就可能在路徑

依賴不斷強化過程中，走向發展的死胡同。正因為如此，如何通過制度創新來克服轉型期路徑依賴，是中國改革時期的演化政治學的重大研究課題。

四

研究中國轉型政治學，一方面，要廣泛吸收國際政治學現有的理論資源。西方政治學中的極權主義，權威主義，現代化理論，政治發展理論中的發展型危機、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命令貫徹與政治參與危機，政治參與爆炸理論，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中的路徑依賴與試錯理論，杜爾凱姆 (Émile Durkheim) 的失範理論，林茨提出的「蘇丹式政權」腐敗理論，奧爾森 (Mancur Olson) 提出的軟政權與分利化理論，都對思考中國政治轉型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另一方面，理論創新對於研究中國轉型具有尤為重要的意義。國際政治學界提出的許多有關政治發展的理論概念，是在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運用這些理論方法來分析中國政治時，就可能出現理論與研究對象不兼容的問題。這就需要根據我們研究的中國對象的特殊性，對源於西方的政治學概念軟件，作「漢化」處理。當對現存概念方法作「漢化」處理而仍然不足以解釋中國發生的政治現象時，就需要我們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去「開發新的軟件」，另闢蹊徑，去建構一些新的概念。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大的現代化轉型社會，它所具有的十三億人口的巨大規模效應，它自洋務運動以來經歷了一百四十年的充滿曲折、艱辛與創傷的歷史經歷，二十多年來中國轉型實踐所提供的如此豐富、複雜而又獨特的歷史經驗，這些歷史經驗，又可以向西方政治科學提出許多挑戰性的問題。所有這些，都表明中國改革的政治學研究，理應成為國際政治學領域中最富有生機、最具有開拓前景的學術領域。中國大轉型時代的現實矛盾與困境，又無時不刻地刺激着我們這一代學者，迫使我們去理解它們，並為克服它們而竭盡自己的心智。正因為如此，中國政治學理應成為對國際政治學做出重大貢獻的最有希望的領域，我們應有志於運用我們自己在本國政治學領域的辛勤耕耘與理論創新，來豐富國際政治學的思想資源。生於這樣一個國家，生於這樣一個時代，中國學者的人生價值與社會責任感，都將在這一耕耘中得到最充分的體現。

研究中國轉型政治學，一方面，要廣泛吸收國際政治學現有的理論資源。另一方面，理論創新對於研究中國轉型具有尤為重要的意義。運用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理論方法來分析中國政治時，要作「漢化」處理，甚至要「開發新的軟件」，另闢蹊徑，去建構一些新的概念。

註釋

① 蕭功秦：〈後全能體制與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政治發展〉，載《與政治浪漫主義者告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207-208。

②③ 參見賈根良、趙凱：〈演化經濟學與新自由主義截然不同的經濟政策觀〉，《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6年第2期。